

莲溪水声忆故乡

| 周宏伟 文 |

老街南面的那条河,自古以来就叫莲溪,流淌了上千年,至今还没有断流。

河水从莲蓉庵的墙根下淌过来,绕过莲蓉桥的大石拱,在桥墩那里转个圈,再慢悠悠地往西去,一直流过唐德桥。过了唐德桥,莲溪就到头了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浜斗。我从十八岁离开那里,四十多年了,日子就像莲溪里的水,看起来流得慢,可一回头,已经拐过了几个连自己都记不清的弯。可这水声总在梦里响着,带着从小桥头、干戈头那边卷过来的稻花香。

一

莲蓉桥是用秦望山上开下来的石头造的,高大,厚实,拱券上长满了厚厚的青泥苔。桥面的石板被几百年的脚步磨得油光水滑,雨天走上去得留神。小时候最爱趴在桥栏上看船,乌篷的、水泥的、铁壳的,突突地从桥洞底下穿过,船尾犁开一道白花花的水痕,慢慢地,那水痕又在远处合拢了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船老大光着膀子摇橹,橹声唧唧呀呀的,从桥洞底下传上来,嗡嗡地回荡着,像莲蓉庵傍晚的钟声在瓮里闷着响。夏夜贪凉,我常独自溜到桥上躺着,青石被白天的日头晒得温热,背脊贴上去,能感到石头的脉搏。桥下的水声忽远忽近,远的时候像从北庄的灌园里飘来的松涛,近的时候又像母亲的鼻息,贴着耳朵根子吹。我就在那水声里慢慢闭上眼睛,觉得自己变成了桥墩下的一蓬野草,一动不动地长在那里,长进石头的皱纹里。

站在莲蓉桥的最高处望出去,北七房老街像一条被岁月晒旧了的蓝印花布带子,松松地系在莲溪北岸。街东是莲蓉庵,街西是北七房小学,街中是密密匝匝的铺面和住家,再往北去,诸巷、周家巷、祠堂巷、三堡巷、黄天宕,几条或明或暗的弄堂像布上的经线,把整个镇子织成一片厚实的青灰色。早晨四五点钟,天还没亮透,最先醒的是桥下的莲溪,水声由夜里的幽咽转为清亮的响动,接着茶馆店和老虎灶的风箱开始呼呼地喘气,然后就听到华巩老师吹笛子或拉胡琴的声音。奶奶常说,北七房街是靠水声和吆喝声活过来的,没了这些声音,街就成了个空壳子。

二

明清时候,华氏族群北迁来到古老的莲蓉村,随着人数增多,地名也改称北七房。由于人口众多,逐渐形成了热闹的街市。街东的莲蓉庵,公



江南腔调工作室



元1612年由华义中等乡绅出资建造,整日香火缭绕。山门上的砖雕被风雨啃蚀得面目模糊了,只隐约看得出是缠枝莲的纹样。庵里的老尼姑,灰布袍子洗得发白,念经的时候眼皮也不抬一下,木鱼笃笃地敲着,不快不慢,像光阴的脚步一步步踩在石板上。庵里有一棵老桂树,树冠几乎遮住了半个院子,秋天开花的时候,满街都是甜的。老尼姑会扫了落花,晒干了装在小布袋里,送给我们这些街坊邻居的小孩泡茶喝。有一回我偷摘了一大捧桂花塞在书包里,第二天上课整个教室都是甜的,马老师吸着鼻子在教室里转了一圈,最后停在我的课桌前,笑咪咪地说,你的书包里是不是藏了整个秋天?再后来庵里的钟声也渐渐稀了。某一年回去,山门紧闭,从门缝里往里望,桂树还在,花自顾自地开着,只是院子没人扫了。

北七房老街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,两边的木板门面一间挨着一间。剃头店的转椅锈了,坐上去吱吱呀呀地响,可老师傅的剃刀还是快。铁匠铺的砧子锃亮,老铁匠姓陈,打了一辈子铁,铺子门前常年挂着一串铁打的蚂蚱,风吹过来,叮叮当当地碰着响。最热闹的是每天清晨的早市,街两边的摊子一个接着一个,讨价还价的声音从街东传到街西。有个卖糖人的老头,摊子支在剃头店门口,担子上插满了金黄色的糖人,孙悟空、猪八戒、关公耍大刀,太阳一照,透亮透亮的。奶奶牵着我的小手上街,从周家巷走过来,穿过墙门里长长的弄堂,在卖豆腐花的摊子前停住。摊主是个驼背的老头,铜勺在桶里一搅,豆花香就漫开来,撒上紫菜虾皮和一小撮葱花,那碗豆腐花我现在还记得味道——滚烫的、滑嫩的,一口下去,整个童年的早晨就暖起来了。

三

街西的北七房小学,前身叫莲蓉小学堂,公元1905年由华绶言先生创办。青砖黛瓦的校舍,门前有两株银杏,一公一母,公的只开花不结果,母的每年秋天都挂满白果,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。书声从那时起就没断过,我父亲在那里启蒙,我也从三年级一直读到小学毕业。教室的窗户是木格子的,冬天冷风从缝里灌进来,老师就让我们挨着墙根跺脚取暖,几十双小脚一起跺,轰轰的,像莲溪发了春汛。马老师喜欢在课间带我们去莲溪边认植物,水蓼、芦苇、菖蒲,一样一样地指给我们看,说名字都是有来历的。他

的圆框眼镜滑到鼻尖上,看我们的时候眼睛从镜片上面翻出来,笑咪咪的,像莲溪里那种叫作鳊鳊的银白色小鱼。

拐进墙门里的弄堂,人走在里面像走在一条深深的沟里。弄堂里有几间瓦房,墙皮剥落得厉害,这里就是冠尘小学的旧址了。说是小学,不过是华冠尘老先生的三间厢房。1937年抗日战争的战火烧过来,公学停了,镇上别的先生都避难去了,只有他不肯走,在自家院里摆开桌椅给孩子们授课。三杯黄酒下肚,便领着学生直奔北庄灌园。灌园是宋代名将邓尔瞻的坟场,碑石横斜,冠尘先生就在坟头教学生写字,指着石碑教学生认碑文:“‘先考’二字须写得如孝子叩首,有敬意,有哀思,笔画里要有骨头。”月圆之夜,他又领学生去大坟园背诗,青布长衫立在荒冢之间,吟诵声清越悠远。有一年发大水,莲溪漫了岸,教室里的水齐了膝盖,他就把学生领到莲蓉桥的拱顶上,坐在最高的那级台阶上上课,底下是滔滔的黄水,他讲的是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声音不高,却盖过了水声。那辈人教书,教的不只是字句,更是筋骨,是魂魄。后来我才明白,那些声音不是盖过了水声,是沉进了水底,等水声一遍遍地把它们洗出来。

群声小学在街北的祠堂巷,用的是诸氏宗祠和陈氏家祠。1948年8月,两座祠堂的围墙中间被打通,群声小学正式挂牌成立。我的母亲马敏之也曾在这里教书。大哥大姐说,小时候去母亲学校等她下课,坐在祠堂改成的教室里,能看见梁上悬着的祖宗牌位。院子角落里有一口井,井水清冽,课间学生们趴在井沿上往下看,能看到自己的小脸在深处晃啊晃,井壁上长着蕨草,绿得发黑。井边种着一棵老槐树,花开的时候,满院子都是白花花的,风一吹,花瓣落在井水里,慢慢地打着旋儿沉下去。

四

街北深处是周家巷。我家的祖屋就在巷子中段,是一间七架屋的老瓦房,门槛被几代人踩得凹下去一个弧度,每次迈进去,脚底都会触到那个凹陷。爷爷十六岁去上海学生意,在十六铺码头扛过包,在南京路的绸布庄当过学徒。爷爷走的时候奶奶就站在门口相送,手里纳着鞋底,针尖在头发上抿一抿,低着眉眼说“早些回来”。1943年,爷爷被日军掳去杀害,再也没有回到周家巷。那年,父亲十六岁。长兄为父,父亲和

奶奶一起起早摸黑,靠种北塘河边的六亩水田,养活了一家七口人。奶奶一直留着爷爷用过的那个铜锁,锁面上刻着缠枝莲的纹样,和莲蓉庵砖雕上的几乎一样。

周家巷的巷口有一棵老枣树,树身粗得两个大人才能合抱。树下常年摆着几块磨盘,夏天傍晚,男人们端着碗聚在这里吃饭,碗里的粥映着天光,稀溜溜地喝出响声,筷子头点着各家各户的子弟,闲言碎语,一夜之间传遍前村后巷。小小的周家巷,人才辈出。奶奶提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教授的周树图时总说,他那个南洋腔调里,还黏着周家巷的尾音。诸洵治在上海大学做博士生导师,实验室里挂着一幅他父亲手抄的《莲溪棹歌》。诸亮东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,逢年过节给老家人打越洋电话,问的还是惠家浜上那座“木桥头”有没有改成水泥桥。那些从巷子里走出去的人,像莲溪里放出去的荷灯,漂得再远,灯芯里点的还是故乡的火。

枣树下的磨盘上,消息们长着腿从这里出发。我的三叔周品兴,便是这些消息里被传得最远的一个。三叔幼年丧父,诸家长辈可怜他,顺手把他带去上海。起初在家里做佣人,擦地板、倒痰盂、生煤球炉子,小小的个子踮着脚才能够到窗台。夜里别人睡了,他躲在灶披间里读书。长大后,白天到工厂做工,晚上去读夜校,口袋里总揣着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诸家老板有意提携家乡人,见三叔勤勉踏实,便培养他参与管理。三叔后来担任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厂长,成为国企领导。每年清明,三叔总要回周家巷扫墓。巷子窄,他的轿车开不进去,便停在巷口的枣树下,拎着皮鞋光脚走进来,说是要沾沾老家的地气。

前些年回去过一次。周家巷拆了大半,祖屋也没了,那口老井被水泥封死,井圈不知去向,地面上只留一个圆形的印记,浅浅的,像一枚盖过千封信后、再也看不清日期的老邮戳。北七房老街上的石板全换成了水泥路,两边的木门面刷了红漆,陌生得叫人不认。我站在街口发了一会儿愣。从前剃头店的位置现在是一家麻将馆,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从里头涌出来,压过了莲溪的水声;老铁匠铺的招牌不知被谁卸了去,门前那串铁蚂蚱也没了踪影。学堂里的那棵紫薇树还顽强地活着,但旧校舍拆了,取而代之的是几排铁皮壳子的厂房,切割机的声音吱吱地响着。我站在门口往里望了很久,直到看门的老头出来盘问我找谁。我说不找谁,就是路过。

走到莲蓉桥上,我扶着光滑的石栏杆往下看,桥下的货运码头早被杂草封住了,从前船来船往的河道长满了芦苇,风一吹,白茫茫的花絮漫天飘。只有莲溪的水还在流着,哗哗的,哗哗的,声音轻了些,却没断。那些葬在地名里的人和事,化成了泥土的祖屋和学堂,都被这水声一遍遍洗着,越洗越亮,越洗越清晰,清晰到我能看见姐姐们蹲在井台边洗碗的背影,听见母亲在灶间唤我吃饭的声音,闻到奶奶晒在天井里的棉被那股太阳的味道。

我知道,故乡从不曾走远,它只是化成了水声,住进了耳朵最深处。